

中国哲学

的创造性转化

吴根友
欧崇敬
王立新

主编

云南人民出版社

中国哲学

的创造性转化

吴根友
欧崇敬
王立新

主编

云南人民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中国哲学的创造性转化/吴根友、欧崇敬、王立新主编
—昆明:云南人民出版社,2004.5
ISBN 7-222-04019-6

I. 中... II. ①吴... ②欧... ③王... III. 哲学—
中国—21世纪—国际学术会议—文集 IV. B262-53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4)第 024588 号

责任编辑:陈盈盈

装帧设计:杨晓东

责任印制:马跃武

书 名	中国哲学的创造性转化
作 者	吴根友 欧崇敬 王立新主编
出 版 社	云南人民出版社
发 行 社	云南人民出版社
社 址	昆明市环城西路 609 号
邮 编	650034
网 址	YNRM.peoplespace.net
E-mail	rmszbs@public.km.yn.cn
开 本	850mm×1168mm 1/32
印 张	18
字 数	442 千
版 次	2004 年 4 月第 1 版第 1 次印刷
印 数	1—1000 册
排 版	昆明市五华区教育委员会印刷厂
印 刷	昆明市五华区教育委员会印刷厂
书 号	ISBN 7-222-04019-6
定 价	30.00 元

尊敬的读者:若你购买的我社图书存在印装质量问题,请与我社发行部联系调换。
发行部电话:(0871)4194864 4191604 4107628(邮购)

跨世纪的回应

——关于“中国哲学的创造性转化”的思考(代序)

“中国哲学的创造性转化”论题既是中国文化的“综合创新”与“中国传统的创造性转化”等论题的逻辑延伸，也是新世纪里中国学人对中国哲学发展的一种希望。粗略地回顾 20 世纪中国学术史，我们大致可以从四个方面来思考“中国哲学的创造性转化”的条件：第一，早在 20 世纪 30 年代，张岱年先生就率先提出了中国文化的“综合创新”的观点。最近，方克立先生又提出要深化对“综合创新”文化观的研究（《哲学动态》2002 年第 4 期）。第二，20 世纪 40 年代以后，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在《新民主主义论》中将“新民主主义文化”定义为“民族的、科学的、大众的”新文化，代表了中国马克思主义者对中国文化“综合创新”的一种新的认识。20 世纪后 20 年，以冯契为代表的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家，通过对金岳霖“所与是客观的呈现”的认识论进行马克思主义唯物论和实践论的改造，并将佛教哲学“转识成智”命题纳入唯物主义实践论的范畴，提出了“平民化的自由人格”的新理想，在“中国哲学的创造性转化”方面迈出了重要的一步。第三，从国际汉学的角度看，海外华裔学者的一些有关中国传统与中国哲学的创造性转化和论述，可以作为“中国哲学创造性转化”的思想前缘，如 20 世纪 60 年

代末，70年代初期，美籍华裔学者林毓生先生在阅读 Robert Bellah 的 *Religion and progress in Modern Asia* 一书时(约1967年左右)，看到了 Creative transformation (创造的转化)一词，非常喜欢。后来给殷海光先生的信中提出了这一说法。1968年，殷海光给林毓生的回信中大加赞赏，认为“创造的转化”一词非常好，嗣后，林先生在这一领域做了诸多的理论努力，其提出的“中国传统的创造性转化”的观念被海峡两岸的学者广泛接受，如台湾学者韦政通先生从思想史角度，对中国哲学、思想自身的创造性转化历程做出了一系列的论述。20世纪80年代初期，另一位美籍华裔学者傅伟勋先生提出了“创造的诠释学”的观念，并在他自己的哲学研究中，运用现代西方分析哲学、语言哲学的工具，对中国传统哲学中的儒道释三家的重要哲学命题和概念进行了富有创见的解释。近十几年来，美籍华裔学者杜维明教授亦继续推进中国哲学的“创造的转化”工作，尤其在儒学的创造性转化方面作出了可贵的贡献。第四，20世纪一百年来的中西文化交流和近50多年来的地下考古的重大发现，使中国哲学获得了自己新的生命力和前所未有的新材料。局部改写中国思想史、哲学史，重新调整人们对中国哲学的认识已经成为可能。而近20年来，大陆部分学者重写了一些新的中国哲学史、中国思想史著作，他们的工作构成了“中国哲学的创造性转化”的有机组成部分。最近两年，《哲学研究》、《哲学动态》上发表了一些讨论中国哲学与哲学史形态的文章，已经逐渐地将“中国哲学的创造性转化”提到显著的位置。他们的这些学术成果都将会成为“中国哲学的创造性转化”漫长征途中一个重要的思想驿站或脚步，也构成了20世纪下半叶中国哲学多元的创造性诠释与发展的道路之一。

因此，“中国哲学的创造性转化”论题的提出，是在21世纪经济全球化与文化多元化的大趋势下，对前辈学者提出的相关

学术问题的跨世纪回应，是对当代新儒家、新道家、新启蒙主义、自由主义与保守主义、中国马克思主义研究等相呼应的学术研究主题的理论综合与哲学抽象。300多年前，面对汉民族文化的危机，王夫之提出了“六经责我开生面”的宏伟文化理想；面对当前人类所遭遇的一系列重大问题：如全球伦理、生态伦理、生命伦理、世界和平，21世纪的中国哲学，应当充分发掘本土文化资源，更加广泛而又深入地吸收西方文化，锻造自己的哲学思维新工具，对目前人类遇到的重大现实问题给出中华民族的智慧性的回答，使中国哲学在新的时代里达到自己新的辉煌。

任何思想的创新都需要一种探险精神。“中国哲学的创造性转化”亦是如此。思想的创新如果没探险的精神，恐怕就没有“新大陆”的发现。试想一下，100年前，当康有为写《孔子改制考》的时候，又何尝不是一次经学诠释的探险？当熊十力创作《新唯识论》，金岳霖写《知识论》、《论道》等著作时，何尝不是中印西哲学汇通道路上的探险？而20世纪上半叶的思想创造，哪一次不是思想的探险？没有思想的探险，就没有20世纪上半叶的思想创造，就没有整个20世纪中国哲学事业的第一次繁荣。在一定的意义上说，从事哲学研究的人文工作者可以贞定为“思想的教练与精神的探险者”。从传道、授业、解惑的角度看，哲学工作者是思想的教练；从研究的角度看，哲学工作者又是思想的探险者。没有这种探险，我们的思想园地就不可能突破已有的界域，就不可能从思想层面对人性进行深度的开掘，也就不可能有人类精神百花园里的群芳争艳。

当然，这种“思想的探险”又不是徒步搏虎，赤手泅河，而是面对人类的现实困境和可能遇到的困境，依靠对经典的深度理解与诠释，从中外已有的智慧宝库中汲取精神营养，为了解决人类在新的实践中遇到的理论难题，同时也是为了思想自身，提供具有想像力、创造力的思想方案和思想阅读。只有依托传统而又

不囿于传统的思想探险，才有可能像哥伦布一样，找到思想的“新大陆”。

我们期待着更多的人加入到这一思想探险的行列，也期盼得到更多前辈专家、学者与同仁，支持、鼓励这种思想的探险，为了中国哲学事业的繁荣，为了中华民族的精神生命永葆青春活为，从不同的哲学主题出发，推进中国哲学在当代的“创造性转化”。

本论文集收集的绝大部分论文，都是2002年9月20~24日在武汉举行的“第一届海峡两岸傅伟勋、韦政通与当代中国哲学的创造性转化”学术研讨会的论文，和“中国哲学的创造性转化高级研讨班”（9月16~20日）的讲座教授文章和学员论文。有些与会者的论文或因为已经发表过，或因为没有寄来修订稿文本，故没有收录。

应该特别感谢的是欧崇敬教授、王立新教授为会议筹措的经费，没有他们的辛勤劳动，这次会议不会开得那么顺利。也感谢武汉大学外事部、社会科学部和其他相关部门对此次会议的大力支持。感谢武汉大学哲学系为本论文集提供的出版经费，感谢武汉大学中国传统文化研究中心为本论文集的编纂提供了良好的办公条件。最后要特别感谢陈盈盈编辑为本论文付出的辛勤劳动。但愿在武昌召开的第一届“当代中国哲学的创造性转化”的学术会议，随后在全国各地不同的地方能继续召开下去。

吴根友

2003年3月12日于珞珈山南麓
武汉大学中国传统文化研究中心

目 录

第一辑 傅伟勋与创造的诠释学

- 关于中国哲学的创造性转化的思考 刘纲纪(3)
- 傅伟勋致刘纲纪二十七封书札 吴根友、荆 雨 整理(27)
- 深情怀念傅伟勋先生
- 兼论傅先生的学术贡献及傅先生与武汉大学…郭齐勇(46)
- 读傅伟勋教授生死体验的新著
- 《死亡的尊严与生命的尊严》..... 郭齐勇(61)
- 创造的诠释学——一条通向未来中国哲学的可能之路
- 傅伟勋的哲学思想探析..... 吴根友(72)
- 从比较哲学看傅伟勋诠释中国哲学的新思路 蒋国保(102)
- 关于“现代人死亡问题”的深思
- 从傅伟勋教授的命题谈起 郑晓江(124)
- 傅伟勋的哲学探求与日本学者之著 徐水生(142)
- 禅道哲理化、现代化与世界化的探索
- 傅伟勋禅学研究与中国禅道的创造性转化…刘泽亮(152)
- “创造的诠释学”与中国传统的“创造性转化”..... 张斌峰(166)

“外王之道”与文化价值的两难选择

——傅伟勋“生命的十大层面与价值取向”模型

理论评析 储昭华(198)

傅伟勋思想中的认识论问题 张世保(211)

傅伟勋创造性诠释学及其于儒家心性论之应用 荆 雨(223)

走出儒家泛道德主义的困局

——读傅伟勋《从西方哲学到禅佛教》 林合华(239)

生命的悲剧意识及其超越：傅伟勋与“生命的学问”

..... 胡伟希(263)

第二辑 韦政通与中国传统的创造性转化

现代新儒家对全球化运动的反思

——以梁漱溟、冯友兰、徐复观为中心 李维武(279)

中国思想由“传统”向“现代”转换的新阐释

——韦政通著《中国十九世纪思想史》读后有感 ... 李维武(320)

在传统主义和自由主义之间

——由韦政通与牟宗三和殷海光的关系说起 王立新(333)

韦政通与殷海光

——以传统的批判和重建为中心的考察 何卓恩(356)

思想家韦政通先生的伦理关怀 尹文汉(373)

韦政通的伦理思想简论 王向清 黄守红(385)

《中国思想传统的创造转化——韦政通自选集》

编辑说明 陈盈盈(390)

第三辑 思想的探险

中西汇合后的形而上学 欧崇敬(397)

后新儒学的规模与向度：对比与差异 林安梧(424)

海德格尔与道：海德格尔思想的“转折”与其对中国道家的关注·····	赖贤宗(453)
对傅伟勋谈中国哲学工作方法及方法论观点之评析 ·····	杜保瑞(472)
儒家哲学中的死东西与活东西 ——关于儒家创造性转化的一点感想·····	刘清平(504)
儒佛相通 ——由境界形而上学谈起·····	宁新昌(516)
从边地出发 ——有关中国文化问题的一次思想旅行·····	梁 枢(529)
中国哲学的创造性转化高级研讨班开幕词·····	郭齐勇(545)
“第二轴心文明时代”观念视野下的中国文明及其出路 ——高级研讨班闭幕词·····	吴根友(552)
“中国哲学的创造性转化”高级研讨会综述·····	唐 娜(559)

第一辑

傅伟勋与创造的诠释学

关于中国哲学的创造性转化的思考

一

我们所要讨论的题目是“中国哲学的创造性转化”。按我的理解，这看来主要是针对中国传统哲学(中学)而言的，但似乎也可包含西方哲学(西学)和马克思主义哲学(我称之为马学)。在和过去相比已经发生了巨大变化的当代历史条件下，不仅中学需要有“创造性转化”，西学与马学亦然。而所谓“创造性转化”，我赞同傅伟勋的说法，就是“批判地继承”与“创造地发展”，也就是在批判地继承过去的思想遗产的基础上，大力进行理论创新。

二

自近代以来，中国哲学的创造性转化常常碰到一个“体”与“用”的关系问题：是以中学为体、西学为用呢，还是反过来，以西学为体、中学为用？如果从马学的观点看，我认为这个问题应分为两个不同的层次来回答。第一个层次是“学”与客观实际或现实社会生活的关系。在这个层次上，客观实际是“体”，一

切“学”(包含中学、西学、马学)都是“用”。因为一切“学”的目的归根到底是要从理论上解决客观实际、现实社会生活提出的问题,而决不仅仅是为了解决纯思维领域中发生的问题。正因为这样,当客观实际发生了重大变化,“学”也或迟或早也要发生重大变化,即要求实行“创造性转化”。第二个层面是“学”与“学”之间的关系问题。这是因为任何一种“学”都不可能脱离在它之外的其他各种“学”而孤立地存在和发展。它既要坚持它所主张的某种根本性的思想、观点,这就是它的“体”;与此同时,它又要从它认为可以采取的其他的“学”之中吸纳某些思想、观点,以阐发、扩展、论证它自己的思想、观点的正确性与普适性,这就是它的“用”。拿“当代新儒家”来说,儒学是它的“体”(但它从传统儒学中采取的东西主要是程、朱、陆、王的心性之学),西方的科学民主思想以及它认为可以用来阐发、论证儒学的西方哲学思想(如牟宗三所讲的康德哲学、冯友兰所讲的新实在论哲学),则是它的“用”。通过此“用”而“返本开新”,以证明“当代新儒家”的思想具有不可忽视的重大意义。再从马学来看,马克思主义的基本理论是它的“体”,与它不同的古今中外的一切“学”(包含“当代新儒家”),只要在它看来具有某种合理性的东西,则都是它的“用”,可以而且应当批判地吸纳改造,以丰富发展它自身的“体”。从这点看,在“学”与“学”之间的关系这个层次上讲“体”与“用”的关系,马学的观点最具开放性。如“当代新儒家”是否定、拒斥马学的,而马学则并不简单地否定、拒斥“当代新儒家”。上述解决“体”、“用”关系的两个不同层次,既有联系,又不能混同。如李泽厚提出的“西体中用”论,既有某种启发性,同时又因为将两个不同层次的“体”、“用”关系混在一起讲,所以很难讲通。

三

我们今天讲“中国哲学的创造性转化”不能脱离中国当代实际存在的各种思潮来讲。我认为中国当代实际存在的思潮共有五种：(1)马克思主义(包含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它在中国处于主导的、指导的地位。(2)以“左”的形式出现的“马克思主义”，它与邓小平理论是对立的，至少是难以相容的，但未形成公开的、系统的理论形态。(3)西方自由主义的理论，它已在不少文章、著作中表现出来，但一般是竭力颂扬中国五四运动以来的自由主义者(如胡适)的思想，为它争取在中国现代思想史上的地位，或追随、介绍、鼓吹西方自由主义的思想(如哈耶克的思想)。总的来看，也尚未形成系统的理论形态。(4)“当代新儒家”，它有很系统的理论形态，自20世纪80年代后期以来，在中国大陆产生了相当大的影响，吸引了不少介绍者与研究者。(5)李泽厚的“人类学本体论”，或“人类学历史本体论”、“历史本体论”，或“儒学四期说”，它也有相当系统的理论形态，虽然不少人认为它已是过时、陈旧的思想，实际上还有不小的影响。除上述五种思潮之外，当然还可列出80年代一度引人注意的所谓“新启蒙运动”思潮，以及90年代以来日渐被一些人关注的“后现代主义”思潮，但这两者也都没有形成系统的理论形态，没有产生太大的影响。依据以上的看法，本文将着重评论上述第一、三、五三种思潮，并通过这种评论来尝试探讨一下中国哲学的创造性转化问题。

四

在下面的评论中，我将涉及看起来和哲学问题没有什么关

系，或至少是没有什么直接关系的，有关社会、历史、政治等等方面的问题。因为我认为这些问题是我们在解决哲学问题时不能不予以充分注意的。把哲学问题和社会、历史、政治方面的问题等同起来是错误的，这样哲学将失去自己所要解决的特殊问题和它的特殊功能，不再成为哲学。反之，认为有一种和社会、历史、政治绝对无关的“纯哲学”，哲学家所要关注的就只是这种“纯哲学”问题，并且认为只要这“纯哲学”问题一旦获得解决，所有一切问题都将随之解决，这同样是错误的。在这点上，我认为“后现代主义”猛烈抨击“形而上学”，全力以赴地要消解它，是有其合理之处的。但“后现代主义”出世太晚，而且非常缺乏历史感，它不知道早在 1843 年，马克思就已在《黑格尔法哲学批判导言》一文中鲜明地提出了“消灭哲学”、否定迄今为止的哲学的口号，即消灭和否定那种自称凌驾于人类社会历史和个体生存之上，并从根本上决定着人类社会历史和个体生存的“形而上学”的哲学，建立从现实生活出发的，“为历史服务的哲学”。之后，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一书中，马克思又指出哲学“充其量不过是从对人类历史发展的考察中抽象出来的最一般的结果的概括”，这种“抽象”对认识历史有指导作用，但它与过去一切哲学的“抽象”不同，“绝不提供可以适用于各个历史时代的药方和公式”。西方自 20 世纪以来到“后现代主义”，不断有人在讲“哲学的终结”、“后哲学”或“反哲学”。但在我看来，真正在正确的、积极的意义上，而不是在错误的、消极的意义上宣告了过去全部哲学的“终结”的，是马克思、恩格斯，而不是其他任何思想流派。但这些思想流派当然不可能认同马克思、恩格斯在 19 世纪 40 年代已提出的观点，因此，至今为止，它们仍然在为如何“终结”、“消解”哲学而争论不休。从我们今天来看，我们所说的“中国哲学的创造性转化”当然离不开哲学家抽象的思维建构，但这种“创造性转化”所要达到的目

标，是建立一种与社会、历史、政治等等都毫无关系的“纯哲学”呢，还是建立一种与当代社会、历史、政治等等问题的解决相关的，因而能在实际的社会生活中发生较广泛影响的哲学呢？我倾向于后者。但哲学家是人各有志的，兴趣爱好是多种多样的，因此不应也不能排斥“纯哲学”的研究。如果这种研究不是一种纯粹主观臆想的概念思辨与游戏，那么它也可能得到对解决现实社会问题有某种重要的启发性的成果。

五

对于哲学研究的功能与目的，在我国向来有一个比较流行的看法，即认为哲学研究的根本目的在于为个人找到“安身立命”之所。这当然是哲学所不能忽视的一个重要问题，特别是在当今社会日益个体化，个人摆脱了各种依附性关系而不断走向独立的情况下，“我将如何生活”、“我为什么而活着”、“我是谁”、“我从哪里来，将到哪里去”这些问题空前地凸现出来，哲学对这些问题不能不予以深入的思考。但是，哲学如果只停留在这些与个人“安身立命”相关的问题上，以此为它思考的最高目的或终极目的，而忽视对整个人类社会历史发展的思考，那么它不仅不能真正解决这个问题，而且会把个人引入一种脱离社会的、神秘而虚幻的内心体验中去。在这里，个人所能得到的，实际上不过是一种带有自我欺骗性质的抚慰与麻痹。名称则可以很好听的，那就是所谓的“超越”。中国的儒家一向也十分注意这个“安身立命”的问题，但它把这看作是达到“内圣”的功夫，而“内圣”又是为了“外王”，“修身”要落实到“治国平天下”。我认为这正是中国儒家哲学可贵和伟大之处，即它不停留在个人如何“安身立命”的问题上，而要由此拓展到以天下为己任，赋予个人以一种伟大的社会历史责任感（尽管是在君主专制